

元裕之（元好问）

非元裕再辨

劳汉生 吴文环

元裕之即元好问，他是金元之交最负盛名的文学家，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。清代罗士琳将其收入《续畴人传》，于是元好问又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罗士琳为什么要把大文豪元好问收入天算家传记呢？其主要依据是祖颐的《四元玉鉴·后序》。

祖颐在《四元玉鉴·后序》中提到：

平阳蒋周撰《益古》、博陆李文一撰《照胆》、鹿泉石信道撰《铃经》、平水刘汝锴撰《如积释锁》、绛人元裕细草之，后人始知有天元也。^①

罗士琳认为，这里所说的元裕就是元好问。因此，他在《续畴人传》中说：

好问淹贯经传、百家诗文，为一代宗工，兼通九数天元之学。弱冠受知于杨云翼、赵秉文两学士。遂登其门，又与李冶、张德辉相友善，时号龙山三友。曾因刘汝锴撰《如积释锁》，为撰《细草》，今二书不传，事见祖颐序中。

接着，罗士琳评论道：

世但传遗山（笔者按：元好问号）工诗文而不闻遗山明算数，他书亦绝未叙及，惟《四元玉鉴·后序》云平水刘汝锴

撰《如积释锁》，绛人元裕之（笔者按：祖颐原序此处为“绛人元裕”，罗士琳引祖颐言时多加了个“之”字）《细草》，后人始知有天元。其时，杨云翼、张行简、李冶、许衡、耶律履暨其子楚材皆精算学，又皆与遗山善，遗山既往来于其间，宜亦知算，则其有《细草》也信不必妄。而本传缺载何欤？此盖与《宋史》不为秦九韶立传致大衍求一术几湮，事略相同。夫自有天元而知授时、弧矢相求之妙；亦自有大衍而后知演撰积年日法之故。然则天元与大衍洵沼算者，所必不可少也……由周秦以迄金元，凡授时颁朔诸大典，莫不掌之太史，故司马迁、刘义叟诸公胥得预治算修史之事。嗣是史乘归于词馆，司天别设专官，遂使儒林实学下同方伎。当时，遗山文名又重，自必史臣以为不应有此九九薄能，致《细草》亦沦替无存，噫，是何贵末贱本之若是欤！又刘汝锴其人不详，据遗山北渡初献书中令公请以一寺院所费养天下名士，书中枚举者有刘汝翼名，未知即其人否？俟考。②

罗士琳上面这段文字意在表明：元好问通算学且《细草》过刘汝锴《如积释锁》。就是说，金元之际的数学家元裕就是元好问即元裕之。这一观点他在“松庭先生《四元玉鉴·后序》”注文中再一次提出，说明罗士琳对此是深信不疑的。但是，这其中有两个疑点：一是元裕之是怎么变成元裕的，元裕是元裕之之误，还是元好问字为裕呢？二是元好问系出拓跋魏，其先自汝州（今河南临汝县）迁平定（今山西平定县）又迁忻（今山西省忻县），其父元明德及元好问本人在《金史》上也明白无误地写作“太原秀容人”，怎么会变成“绛人元裕”的？

《山西通志》曾批评了罗士琳的元裕即元裕之之说③，但没有提出充足的理由。在中国科学史界中，大概是李俨最先见到了《山西通志》的驳正。他虽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但也未做详细

考证,因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。他认为,祖颐序中的元裕与元裕之(元好问)非同一人;数学家元裕与李冶、张德辉是知己,曾共游封龙山。例如,李俨《中国算学史》、《中国数学大纲·李冶传》,均提李冶“晚家真定府元氏县之封龙山,与元裕、张德辉友善。”^④不采罗士琳的李冶、元好问,张德辉同游封龙山的说法。李俨之后,钱宝琮^⑤、梅荣照^⑥、兰丽容和洪天锡^⑦等在元裕与元裕之的问题上几乎全仿李俨之说,就连1973年美国出版的《科学家传记辞典》(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),也是这样提法。例如,梅荣照在《李冶及其数学著作》一文中较为明确地说:“李冶与元裕同为‘龙山三老’之一,祖颐《后序》只提到元裕的著作,没有提到李冶的《测圆海镜细草》,而《测圆海镜细草》又是目前有传本的唯一著作,究竟李冶对天元术有何贡献,《测圆海镜细草》在天元术发展中占何地位?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”又说:“李冶与元裕是很要好的朋友,他们的著作,来源各不相同,前者是来源于‘洞渊九容之说’,后者来源于刘汝锴的《如积释锁》,跟着自然就是元裕的《细草》而不是李冶的《测圆海镜细草》了。”^⑧又由于自李俨以后诸家都认为元裕与元裕之不是同一个人,所以他们的文中均强调数学家元裕“生平事迹不可稽考”(笔者按:关于元裕之,正史上有传而且有大量原始资料记述其一生的行踪)。

我们认为,自李俨以后诸家的论述,尚不能自圆其说。

首先,查元好问、李冶、张德辉等人的传记资料,俱记是元好问与张德辉、李冶情投意合,且曾共游封龙山。如《元朝名臣事略·张德辉传》载:“(德辉)与遗山、敬斋(笔者按:李冶号)游封龙山,时人目为龙山三老云。”^⑨《元文类》、《遗山文集》等最具权威的史料都言元好问与张德辉、李冶游封龙山,而不言元裕踪迹。可见,与李冶、张德辉交游者为元裕之而非元裕。因此,罗士琳谓“(元好问)又与李冶、张德辉相友

善”并不误。

不过，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变得扑朔迷离了。按罗士琳的观点，上文提到的两个疑点仍无法排除。采李俨之后诸家之说，据《元朝名臣事略》、《元文类》、《遗山文集》等原始资料所载，我们可以断定是元裕之而非元裕曾寓封龙山，便可因之立刻导出此种矛盾。至于史学界，由于对元好问是否通算学不甚关心，也不见有关考证。^⑩那么，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何在呢？下面我们先来陈述一下罗士琳“元裕即元裕之之说”不能成立的理由。

罗士琳“元裕即元裕之之说”之所以不能成立，关键在于地点与时间上不能吻合。其一，依祖颐《后序》言“绛人元裕”。查《辞源》，“绛人”词条是指绛地方人或泛指老人。祖颐列“平阳蒋周撰《益古》、博陆李文一撰《照胆》、鹿泉石信道撰《铃经》、平水刘汝锴撰《如积释锁》、绛人元裕细草之”。其中，平阳、博陆、鹿泉、平水皆为地名，所以说这里的绛人当指绛地之人。绛地有二，一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，晋穆侯自曲沃县迁都于此，孝侯时改名翼，景公迁新绛后改称故绛；二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，原名新田，晋景公迁都于此，改名新绛，也称绛，汉为绛地，周勃封为绛侯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十二所谓绛州是此地也。事实上，祖颐序中的刘汝锴和元裕是同乡，都是今山西新绛县人。因为平水是金时县名。元脱脱等《金史》卷二十六志第七地理下称：“绛州……县八……平水（金）宣宗兴定四年（公元1220年）七月，徙置汾河之西，从平阳公胡天作之请也。”为了避免地名重复，祖颐不再称平水元裕而称绛人元裕，这是顺理成章，可以理解的。古人姓氏前面的地名，一般是指籍贯（祖籍或出生地）或长久寓居之地。如：栾城李冶、钱塘吴敬、汾阳王文素。上文已经论及，元好问祖籍汝州（今河南临汝县），其后迁平定（今山西平定县），最后至少到其父时已定居忻县（今山西忻县）。再从目前尚存的关于元好问的五十四种原始资料看，对元

好问的称呼绝大多数为“太原元好问”或“太原元裕之”，如耶律楚材致好问书信，原因就是忻县在西汉时为阳曲县地，属太原郡，隋开皇十年改秀容县，十八年为忻州治，因界内有忻水而名，明洪武初年并入忻州，至清为隶州，1912年改为忻县。^①秀容就是忻县，属太原郡。故称太原元好问合情合理。有极个别例外的，那就是《元史·高鸣传》称元好问为河东元裕之。河东：战国时梁有河东地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”秦汉时置郡，黄河流经山西西境，或南北线，故山西境内，在黄河以东者，统称河东。金时置河北东路，治太原府。据此，称元好问为河东元裕之也还说得过去。可是，要称元好问为绛人，那就实在没有道理了。新绛在山西之南，而元好问出于山西之北（平定、忻县均在山西北部太原附近），相距甚远。另外，查翁方纲、凌廷堪、施国祁、余集、李先廷等著的《元遗山先生年谱》^②也不见有元好问久居绛地之说。

其二，李冶与元好问年龄仅差两岁。至李冶时，天元术^③已成为参天大树，枝繁叶茂。如将李冶与朱世杰的著作相比较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冶对朱世杰的影响。如在李、朱二人的书中，都有过去较为罕见的“连枝同体术”（仅南宋秦九韶的书中提及），但朱世杰在南渡前是不可能见到秦著的。除“连枝同体术与之分术”外，可以明显地看出朱世杰书中的一些题目也是受到李冶的影响，可以说李冶的天元术当时已广为人知。按祖颐《后序》中所说的，元裕就是元好问，那么言“后人始知有天元也”就荒唐了，因为李冶无论如何不能算元好问的“后人”。

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问题产生的原因吧！

李俨及其后诸家之所以坚持元裕与李冶、张德辉为至交，罗士琳之所以提出“元裕即元裕之之说”皆源于《元史·张德辉传》中的“（德辉）与元裕、李冶游封龙山，时人号为龙山三老

云。”^④一句。据此，是不是《元史》的作者宋濂在这里出现了笔误，把元裕之误作为元裕了？清汪辉祖《元史本证》认为：“元好问字裕之，（《元史》）不书名而称字又删之字皆误”^⑤（笔者按：但未说明误之由）。经过对《元史》的仔细研究发现，宋濂的错误不仅是在这里把元裕之误为元裕了，而且整部《元史》凡该写元裕之的地方，宋濂差不多都写作元裕了。如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七，“郝经传”首云：“郝经字伯常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泽州之陵川，家世业儒。祖天挺，元裕尝从之学。”又于《元史》卷一百二十七，“郝天挺传”首指出：“郝天挺，字晋卿，泽州陵川人。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。”对照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六《元好问传》，也见记有：“好问字裕之。七岁能诗，年十有四，从陵川郝晋卿学……”。又如，《元史》卷一百六十，《高鸣传》言：“高鸣字雄飞，真定人，少以文学知名，河东元裕上书荐之……”查高鸣生平史料，知元好问曾上书荐高鸣，后来高鸣被授新德路总管，元好问写有《送高雄飞序》一文，载《遗山文集》卷三十七。

所以，只有驳正宋濂之误处，才能正本清源。

综上所述，罗士琳及自李俨以后的诸家观点，正误各半。他们对于科技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同时由于考据欠充分也有偏差。正确的答案应是：元裕与元裕之是不同的两个人，元裕之即元好问，他是李冶、张德辉的挚友，但肯定没有给刘汝锴的《如积释锁》做过《细草》，这从所有关于元好问的史料上来看便可断言，而元裕的活动年代，大概要早于元裕之。

注：

①朱世杰《四元玉鉴》万有文库本5页。

②（清）罗士琳《续畴人传》卷四十七。

③北图馆藏《山西通志》；成化《山西通志》；（清）觉罗石麟等修，储大文等纂《山西通志》；（清）曾国荃等修，王轩等纂《山西通志》等。此处见王轩《山西通志》。

④李俨：《中国算学史》上海书店，（1938）108—109页。《中国数学大纲》科学出版社（1958）209—210页。

⑤钱宝琮：《中国数学史》科学出版社（1964）174。

⑥⑧梅荣照：《李冶及其数学著作》，载《宋元数学史论文集》，科学出版社（1963）124页。

⑦兰丽蓉、洪天锡：《李冶和〈益古演段〉》《科学史译丛》1985年3期。

⑨（元）苏天爵：《元朝名臣事略》卷十，中华书局影印元刊本（1962）7页。

⑩对元好问进行全面研究的有：陈湛铨《遗山先生评传》，载《广州大学学报》1959年1期；吴天任《元遗山述传》，载《中国诗学季刊》（台）1975年1期；李长清《元好问研究》，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（1972）；郝树侯《金元诗人元好问》，《山西师院学报》1958年2期。

⑪《寰宇通志》七十八，“太原府忻州”；《读史方与记要》四十，“太原府”。

⑫翁方纲《元遗山先生年谱》三卷附录，（粤雅堂丛书）；凌廷堪《元遗山先生年谱》二卷（安徽丛书）；施国祁《元遗山年谱》，一卷（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）；余集《遗山先生年谱略》（续夷坚志卷首）；李先廷《广元遗山年谱》，二卷（适园丛书）。

⑬天元术就是用数学符号列方程的方法，“立天元一”是其重要标志。“立天元一为某某”与今“设 x 为某某”一致。

⑭（明）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百六十三，中华书局（1976）3823页。

⑮（清）汪辉祖：《元史本证》卷二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重庆商学院科研处、内蒙古师范大学